

讀者的力量

——清代古詩總集的閱讀、編纂、出版歷程初探^{*}

陳 婧

提 要

古詩總集，或先唐詩歌總集，往往是時人了解唐代以前詩歌傳統的重要媒介。明清以來，先唐古詩總集的編纂與出版蔚為風氣，諸多新刊古詩選本的出版為各類讀者帶來了多樣的閱讀體驗，讀者通過與編者、出版者身分的不斷轉換，從而參與到新出總集的編纂與出版過程中。近年來，學界對明代這類總集的考察較多，而對清代的材料關注不多。本文聚焦於清代古詩類總集文獻，以讀者的功用與角色為討論重點與線索，結合現存總集材料，進行宏觀上的定量分析與微觀上的個案觀察。本文首先對現存文獻進行定量分析與初步梳理概述，隨後按照讀者、編者、出版者之間的角色轉換，討論清代這類書籍的“傳播迴路”，探索不同讀者通過種種方式成為編者或出版者的過程，進而對清代這類總集的閱讀、編纂、出版歷程進行初步勾勒與呈現。

關鍵詞：古詩總集 清代 閱讀行為 讀者 出版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香港城市大學與北京大學 2022 年 7 月合辦的“第二屆京港青年人文學者學術研討會：近世中國的書籍形式與閱讀型態”會議以及 2023 年 1 月底線上舉辦的中港臺明清詩文研習會。特此感謝研討會與明清詩文研習會的組織者與參與者對本文提出的諸多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同時要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給出的具體細緻的修改建議。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傑出青年學者計劃（ECS）25609921：“Reading Poetry, Reading Books: Developing Digital Approaches to Exploring Practices of Reading Pre-Tang Poetry Antholo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500s – 1800s”成果之一。

一、引言：編者即讀者

古詩總集，或習稱的先唐詩歌總集，往往是時人了解唐代以前詩歌傳統的重要媒介。目前，逯欽立先生所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已成為閱讀及了解唐代以前詩歌與詩學傳統的必備總集，此書實則承繼了明清以來編纂與出版先唐詩歌總集的傳統，這樣的編纂傳統始於明代，如他在後記中概述的，“南北朝時期流傳的一些別集總集，到了明朝就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散失了。”¹而此書“編纂是繼承了《古詩紀》又在《古詩紀》編纂基礎上進行了輯補、校訂與整理的。”²從正德年間十六世紀開始，先唐詩總集或古詩總集的出版比起之前有了長足的發展，到了晚明，商業出版興盛，數量上和種類上這類總集都變得更多樣了。

過去十年，學界對明代先唐詩文總集的出版頗多關注，如研究漢魏六朝文學的學者往往致力於梳理重要文獻，對明清出版的先唐詩別集或總集加以輯考、輔以文獻梳理與研究³；而研究明清文學思潮的學者則關注由知名文人所編的先唐詩文總集，從而對時人的文學思想加以探索⁴；最近研究出版文化的學者則致力於從整體及宏觀角度上理解同類總集的編纂與當時大眾出版業的互動⁵。實際上，同類總集的出版與編纂從明代一直延續到清代，在清代，同樣出現了一些由知名學者與文人編纂的先唐詩總集。不過，對清代的情況目前關

1 逯欽立：《先秦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詩》後記，《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55。

2 同上，頁157。

3 如最近出版的《漢魏六朝集部珍本叢刊》匯集影印了261種漢魏六朝文學善本，其中明清版本較多，此叢書按照作家作品別集排次，為當代學者研究詩文別集提供了方便。見劉躍進主編：《漢魏六朝集部珍本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

4 筆者目力所見，學界對復古派李攀龍與《古今詩刪》，沈德潛格調說與《古詩源》等選本的關係等均多有闡述與研究。代表性著作可見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王宏林：《沈德潛詩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5 關於明代古詩總集的出版與接受，可參拙作《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從宏觀角度的考察》，《嶺南學報》第6輯（2016年7月），頁105—133。

注較少。目前對清代的研究似多集中於幾種知名總集，將這些書作為編纂者文學思想的載體，對不同時代不同派別編纂者的文學思想加以研究與綜述⁶。

若是跳出文學理論研究的框架，從出版文化角度來看，清代的情況自然與明代有所相同，也有不少不同之處。本文擬延續之前從出版文化角度對明代的考察，將考察對象擴大範圍至清代同類文獻，從書籍史、閱讀史、書籍的生產流通機制角度將先唐詩總集看作一類特定書籍，考察其在清代的編纂與出版歷程。

在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上，若討論先唐文學總集，《文選》《玉臺新詠》是兩部不得不提及的經典文獻。這兩部總集到了明清二代版本衆多，已自成體系，此文不再贅述⁷。除了這兩部書以外，從十六世紀開始，出於對主流復古派偏重唐詩的不滿，一些明代文人開始為唐代以前的詩歌總集加以補遺整理等工作，如楊慎等看重六朝文學，開始為《文選》編纂各類補遺類詩歌總集，⁸到了十六世紀末，馮惟訥《詩紀》編成，這標誌了一部較為完備的先唐詩歌篇目庫（corpus）的生成。⁹到了清代，清人則沿襲明代的編書傳統，在明代文獻的基礎上繼續編纂新的同類總集。對當代學者來說，出自清人之手，較為知名的便有清初陳祚明的《采菽堂古詩選》、清代中葉沈德潛的《古詩源》、清末王闓運的《八代詩選》等。這些書籍的出版年代不同，操選政標準也不太一樣，然而，相同之處就是他們所選的絕大部分篇目均不出於現在所說的先唐“古詩”，即唐代之前的詩。¹⁰

6 一直以來，對清代知名總集如王士禛《阮亭選古詩》、沈德潛《古詩源》、王闓運《八代詩選》等個案整理出版及研究較多，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均有不少。最近亦有一部博士學位論文對清代古詩選本進行了全面文獻梳理與歷史分期討論，見宋怡心：《清代古詩選本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22年）。特此感謝宋博士惠贈論文及龔宗傑兄紹介。

7 關於《文選》與《玉台新詠》的版本概述，參見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年），頁5—95。

8 關於楊慎的文學主張，可參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82—83。

9 具體過程可見拙作“Reinventing the Pre-Tang Traditio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Pre-Tang Poetry Anthologie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4.1 (2017): pp. 96–119.

10 《阮亭選古詩》乃是選古體詩，然而絕大部分詩仍然是先唐詩。因此仍可認作是先唐詩總集。

對這些清代編者而言,在開始編纂新書之時,他們面對的文化資源有前代經典總集的各種重刊本,也有大量由明人編纂的同類總集。他們往往閱讀並倚賴這些前代文本資源,從而開始編纂新出同類總集。作為編者的他們,因此也是前代同類書籍的讀者。他們如何閱讀這些書籍?如何使用這些文本資源編纂新總集?這些新撰總集又如何最後進入出版?這樣的過程也許可以用書籍的“傳播迴路”(Communication Circuit)來解釋。書籍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曾用“傳播迴路”一詞概論書籍與思想的生產與流通——每部書籍的生命都是一個“傳播迴路”,其間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運輸商、書商、讀者等等角色都對書籍的生產、流通、接受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¹¹ 在進一步論述書籍的“傳播迴路”時,他認為讀者的作用舉足輕重:

讀者完成了這個迴路,因為他在創作行為之前和之後都影響著作者。作者本身就是讀者。通過閱讀以及與其他讀者和作家的交往,他們形成了體裁和風格的概念以及對文學事業的總體感覺,這影響了他們的文本,無論他們是在創作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還是組裝無線電套件的說明……因此,“傳播迴路”的運行是全週期的。它傳遞資訊,在途中改變它們,因為它們從思想到寫作到印刷品再回到思想。¹²

這裏他提出在書籍的“傳播迴路”中,“作者本身就是讀者”。那麼,在對清代古詩總集“傳播迴路”的研究中,這段所說的“作者”便可直接轉換為“編者”,或許我們可以認為,“編者本身就是讀者”。清代編者通過閱讀之前的作品,形成了對這類書籍“體裁與風格的概念”與“總體感覺”,這樣的想法無疑影響了他們新編總集,進而影響了他們的編纂實踐。整個過程

11 見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11.3 (1982): pp. 65–83. 關於這一概念在中國書籍史上的應用,可見 Cynthia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65–83.

12 筆者的翻譯,原文見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11.3 (1982): p. 67.

中，讀者對前代作為知識及文化資源載體的書籍的閱讀體驗無疑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過讀者、編者、出版者之間的角色互相轉換，新出總集進而被生產出來。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並非所有讀者都能在此過程中轉換為編者與出版者，因為並非每位讀者都有編纂、出版的能力。本文所談的讀者僅僅只是書籍實際讀者的一小部分群體，在書籍的“傳播迴路”中，他們成功轉換角色，成為新出書籍的編者與出版者，從而通過這樣的角色轉換歷程參與書籍的生產與流通¹³。那麼如何尋到這些讀者的蹤跡呢？書籍中的序言、跋語等大量副文本（*paratext*）材料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線索。

在研究明清出版文化時，一本書或多本書的實際讀者（*actual readers*）往往較為多樣但難以追溯，但是，從書中所存的序言、跋語等副文本材料中，研究者可以找到關乎書籍目標讀者（*intended readers*）的記錄¹⁴。不僅如此，這些材料實則也記錄了很多實際讀者的閱讀反應。比如這裏談到的古詩總集的副文本材料便是如此。與其他類型的書籍不同，總集作為一種選錄諸多前代文學作品的書籍，其選目與所收錄的材料往往較多重複。在後世新出同類總集的副文本材料中，有的編者、出版者往往會臧否自己讀過的總集，給出自己的評點，從而保留了一部分實際讀者（*actual readers*）對前代書籍的閱讀體驗記錄。通過對這些材料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實際讀者的閱讀過程，從而細察這些書籍的“傳播迴路”。

依筆者目前所見，清代的副文本材料裏，序言、跋語等材料中所描繪的私人化經驗較多，如下文分析所示，這些材料有不少記載了讀者、編者、印刷者與書籍有所關聯的私人閱讀體驗。這是與明代有很大不同的。明代古詩總集的序言中，針對當時主流文壇崇尚盛唐詩的復古風氣，編者往往以唐代以前的詩

13 感謝本文匿名評審對此的建議。

14 對明清印刷文化背景下目標讀者的研究可參見 Anne E. McLaren, “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52 – 183.

歌總集作為文學批評工具，在序言等副文本材料中闡述文學觀的情況似乎較多。¹⁵ 但是，到了清代，詩學理論呈現出集大成的包容性特征，因此“能以超越門戶之見的態度對待詩學遺產”¹⁶。同樣的特色其實在總集的副文本材料中也可以看到，和明代人相比，清代人在副文本材料中多總結前人觀點，較為平和地闡述私人閱讀體驗，進而闡發編纂動機。

通過對這些材料的細讀，若是從讀者的功用與角色作為分析角度切入清代的材料，或許會帶來不同的發現。這裏，本文擬聚焦於古詩總集的“傳播迴路”，探討讀者的角色轉換過程。由於“傳播迴路”的概念與討論可應用在印本時代的所有書籍之上，因此，類似的“傳播迴路”也出現在清代的古文總集、賦選、唐詩選本等書籍的生產與流通中。但是，具體個案上自然多有不同，在閱讀不同類別的書籍時，讀者的反應自然較為不同。本文僅擬以古詩總集為個案，揭示一些總集生產流通的普遍問題，從而希冀從書籍史、閱讀史角度出發，啟發未來對總集文獻的進一步研究。

下文便以讀者的功用與角色為討論重點與線索，結合現存材料，進行宏觀上的定量分析與微觀上的個案觀察。首先對文獻進行定量分析與概述，然後根據讀者、編者、出版者之間的角色轉換，討論清代這類書籍的“傳播迴路”，勾勒出不同讀者是如何成為編者或出版者的過程，進而對清代這類總集的閱讀、編纂、出版歷程進行初步探索與呈現。

二、作為文獻的清代先唐詩總集：定量分析

（一）從明到清：編輯策略的延續

根據現存材料進行嚴格計算，清代的新出先唐詩總集在數量上似乎並沒

15 參拙作《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從宏觀角度的考察》，《嶺南學報》第6輯（2016年7月），頁122—126。

16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頁28。

有超越明代。有明一代，從十六世紀始，共有 67 部選先唐詩類文獻的總集¹⁷。以同樣方法統計清代一朝的總集，且不計入清代新刊刻的《文選》或《玉臺新詠》等經典總集，僅統計清人所撰的、收錄唐以前的詩類總集，檢閱《中國古籍總目》“總集類·叢編之屬”與“總集類·通代之屬”兩個子類，並查對相關圖書館目錄，兼以考察作者生卒年及原書相關信息進行總結，可列表得知清代至少有 44 部¹⁸新出總集，具體書目及大概成書時代可見附表。這些書籍中，有 3 部作者不可知，爲了數據統計需要，也列於此。就類別而言，這些書籍中，共有 2 部叢編類總集（《合刻曹陶謝三家詩》《陶謝詩集》）爲知名詩人別集合刻，其他均爲“通代之屬”的詩類總集，也包括專選樂府、鐃歌等作品的總集。

在編纂這類總集時，作爲前代同類文獻的讀者，清代人基本沿襲了明代人的編輯策略。比如，清人對這些書籍的命名策略基本延續了前代。晚明以後，較多總集以“古詩”命名，以此區別“唐詩”總集與選本，¹⁹也有一些書以“八代”“漢魏六朝”命名。而清代也是如此，在命名策略上，延續前朝，多以“古詩”稱呼先唐文獻，如附表中共有近 20 部總集以“古詩”命名。除此以外，又有多以“八代”“漢魏六朝”指代這一時段的，由此可見在清代人開始編纂同類總集時，指代先唐時段的術語基本已經定型。

（二）成書年代與刊刻年代之分佈

按照可能的成書年代，可將附表所列出的，已知年代的 42 種清人新纂古詩總集分爲以下五組：

17 參拙作《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從宏觀角度的考察》，《嶺南學報》第 6 輯（2016 年 7 月），頁 116。

18 數據來源於“集部”第 6 冊，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2777—2932。然查考近年著作，可見統計數字不一。景獻力《明清古詩選本個案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列出了 51 部清代古詩總集，宋怡心《清代古詩選本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22 年）列出了 76 部清代古詩總集，然二者的統計均計入了古唐合選本，或計入了選入宋元明幾朝詩的通代詩選。筆者這裏採用較爲嚴格的篩選標準，將選較多唐代以後詩的通代詩選全部去除，僅計入多選唐以前的詩類總集，因此最終得出的數字較少。

19 參拙作《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從宏觀角度的考察》，《嶺南學報》第 6 輯（2016 年 7 月），頁 105—133。

表 1 清代新出總集之成書時代分佈

可能成書時代	成書數目	代 表 總 集
順康	19	《采菽堂古詩選》《六朝選詩定論》
雍乾	14	《古詩賞析》《八代詩淘》
嘉道	5	《宛鄰書屋古詩錄》
咸同	3	《八代詩選》
光宣	1	《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

從這裏的時代分佈可以見到，順康與雍乾時期新出總集在數量上較多，而嘉道以後，這類新出總集的數量則較少。但是，由於材料所限，這樣的時代分佈其實是不可能代表全貌的，或許有些書籍已經在流傳中散佚。而且，需要說明的是，附表與表 1 所做的統計中並不計算某部書重印的版本，也就是說，表 1 僅僅根據書的成書年代進行了計算，若計入已刊行的書的重印版本，那麼在數量與年代分佈上無疑會有變化。

依《中國古籍總目》的版本記錄，在這些總集中，版本較多的有王士禎《阮亭選古詩》、沈德潛《古詩源》、王堯衢《古詩解》（記為《古唐詩合解》）。如若加入王士禎一書的箋注本《古詩箋》，則可見王士禎《阮亭選古詩》在清代便有至少 7 種不同印本。²⁰ 並且，似乎是在嘉道以後，這三部書的重印次數才變得較多。如沈德潛《古詩源》在嘉道以後印本頗多，此書現存的 19 種版本中列明嘉道至光宣時代的便有 9 種，²¹ 而《古唐詩合解》除了兩個版本是雍正年間的刻本

20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頁 2915—2916。查考目前收錄古籍較為完善的“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一共可找到六種版本的《阮亭選古詩》共 29 條記錄，而乾隆三十一年刻本《古詩箋》則共 103 條記錄，由此可見現存版本中數量較多的並非原書，而是帶有箋注的乾隆刻本《古詩箋》，參見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http://202.96.31.78/xlsworbench/publish>，2023 年 9 月 10 日訪問。因“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反映的乃存世古籍的數量，而本文這裏僅對不同版本的數量加以統計考察，故此這裏的對比分析仍採用《中國古籍總目》的數據。

21 同上，頁 2916。

以外,其他列明時代的版本有 14 種均是從道光至光緒年間的刻本。²²

由於目前我們無法得知明清時期書籍每次印刷時的印數信息,但是,通過不同版本的數量統計,我們或許能一窺書籍的流行程度,若加入版本生成時代分佈統計,那麼我們或許又能管窺書籍在不同時代的接受與被關注程度。若對《中國古籍總目》中所收表 1 書籍的已知年代的各類版本進行統計,那麼總共則可一共錄得 84 部,這個數字包括了附表所列的新出總集之各種已知年代的刻本及已知年代的稿抄本²³。按照各個版本的生成年代進行數據可視化,可得圖 1。由圖 1 可見,光緒一朝出產、刊刻、印刷的先唐詩總集在版本上高達 27 部,康熙一朝為 18 部。進一步統計可見順康時期生產這類總集共 19 部、雍乾 13 部、嘉道 15 部、咸同 9 部、光宣 28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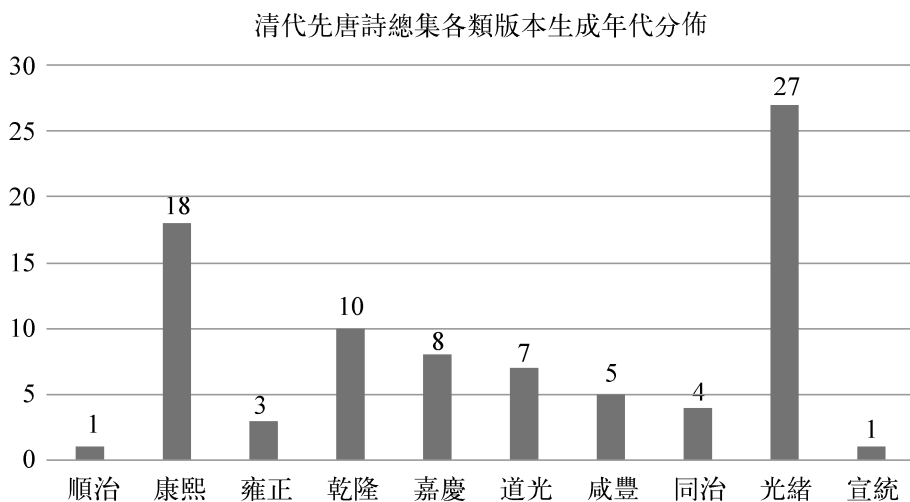


圖 1 清代先唐詩總集之版本年代分佈

若將圖 1 與表 1 的成書年代之分佈加以對比,可見成書年代的分佈與版本生成年代的分佈大有不同。表 1 揭示出有清一代,在順康、雍乾年間,新纂總集較多,而圖 1 則展示出,在較晚的光緒年間,新纂總集的重印本較多。如上文所述,《古詩源》與《古唐詩合解》二書在光宣年間刊刻及重印版本較多,加起來便

²²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頁 2908—2909。

²³ 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統計不包括未注明時代的刻本。

已有 19 種,佔據 28 部光宣年間書籍的近七成。由此可略見二書於清末的流行程度。或許也可以說,這兩部書最初編纂年代與其真正流行及被大眾關注的年代之間間隔較久,其被讀者所發掘所接受似乎有一定的滯後性。

通過上文對現存材料的量化分析,可見到了清代,同類總集的編纂年代與出版年代高峰似乎有所不同,這似乎也暗示了有清一代,新出古詩總集的生成與接受之間具有一定滯後性。若用上文的“傳播迴路”概念討論這個問題,那麼結合文獻資料,可以看到,很多時候,閱讀前代同類總集與新出總集的編選是同步進行的,但是,在編成以後,出版並非同時。或許可以認為,很多時候,這類總集在清代的編選催生於閱讀過程中的實時閱讀反應,但是,是否出版,什麼時候出版似乎並非閱讀者或編者的當下意向。下文便從讀者的角色與功用為中心,討論時人對古詩總集的實時編選及滯後出版。

三、從讀者到編者：實時編纂

在“傳播迴路”中,讀者“通過閱讀以及與其他讀者和作家的交往,他們形成了體裁和風格的概念以及對文學事業的總體感覺,這影響了他們的文本,無論他們是在創作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還是組裝無線電套件的說明。”²⁴ 這個過程中,讀者的閱讀體驗較為重要,在閱讀的時候他們已然有對創作的想法了。因此,在討論清代先唐詩總集的編選時,或許可以認為,從讀者到編者的身分轉變與讀者本人的閱讀經驗與閱讀反應幾乎同步,通過閱讀前代文獻作品,編者已然決定了要如何使用這些文本資源。

的確如此,明清古詩總集所選取的先唐篇章重複很多,一部書的讀者往往也是另一部書的編者。比較明清兩代,似乎可見明代人在序言中並無太多對之前古詩總集等同類文獻的臧否,更多是在討論唐代以前的詩學傳統之價值。而到了清代,文人則在序跋中回顧個人閱讀經驗,臧否點評前代同類文獻,進而闡明編纂動機與目的。通過對這些材料的研讀,或許可以將清代編者的編

24 原文見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11.3 (1982): p.67.

纂模式粗略分爲以下兩類，這也反映出作爲讀者的他們，是如何以兩種方法利用現有的文本資源，進行新的總集編纂事業的，從而轉變爲編者的。第一類是(1)實時抄錄式編纂：也就是將之前總集作爲資料庫按自己的編纂目的直接取用。這樣的編纂模式也與清代文人群體抄書風氣大盛有關²⁵，從總集生成角度證明了清代書籍生成與抄書風氣的密切關係。第二類是(2)臧否前代式編纂：也就是將之前的總集作爲自己編書時的參考書目。以下便從這兩個角度對“讀者到編者”的過程進行闡述。

(一) 實時抄錄式編纂：資料庫的取用

出版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詩紀》在晚明成爲了很多編纂其他同類總集的參考書，如四庫館臣在《詩紀》一條的提要中所言：“厥後臧懋循《古詩所》、張之象《古詩類苑》、梅鼎祚《八代詩乘》，相繼而出，總以是書爲藍本。”²⁶到了清代，明代及更早的這類總集仍然在市場上流通，這使得清代人在編纂同類總集時同樣有機會參考先前的著作。

的確如此，清代的一些知名總集與明代總集關係匪淺。如《采菽堂古詩選》與《詩紀》之間有關係，而《古詩源》又和王士禛的《阮亭選古詩》有關聯。《采菽堂古詩選》的編者陳祚明在凡例中列出了《詩紀》，指明自己所選詩的文本來源便是《詩紀》：

惟古詩用《詩紀》本。北海馮公，博雅君子也，所撰集不致闕略，敢先以問世。²⁷

²⁵ 關於清代的抄書風氣，參見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92—161。

²⁶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古詩紀》及其後續幾部明代同類總集的評論，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89，集部四十二，總集類四。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冊38，頁52。

²⁷ 陳祚明：《凡例》，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3。

同樣,沈德潛在成書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古詩源》例言中也列出了《詩紀》,把《詩紀》作為自己編書的材料來源:

《詩紀》備詳,茲擇其尤雅者。²⁸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到,這兩位編者在編纂新出古詩總集時把前代同類總集作為資料庫進行取用,從前代總集的讀者進而變成了新總集的編者,讀書的過程也是編書的過程。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以《詩紀》中的詩篇為原本,進行摘選,陳祚明是《詩紀》的讀者,同時又成為了《采菽堂古詩選》的編者,他本人又對所摘選的詩篇進行評點,在選擇與評點上體現出他更為講求“情”“辭”的個人化文學主張²⁹。沈德潛也是如此,他所選擇的詩篇來自於《詩紀》,但是同時,他有自己的選擇標準而“擇其尤雅者”。

與同樣以《詩紀》作為文本資料庫的晚明出版的總集相較而言,這兩部清代知名總集的篇目選擇或許更能凸顯編者個人的文學口味。晚明有臧懋循《古詩所》、張之象《古詩類苑》、梅鼎祚《八代詩乘》等同類總集,然而這幾部並無特定的文學標準——晚明編者多是改變《詩紀》選篇的組織原則,從而迎合晚明商業社會讀者的實際需求,如《類苑》按照類別劃分選篇,近似於類書,《古詩所》按照詩體對先唐詩進行重新分類。如果說,《詩紀》作為文本資料庫可以“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³⁰,晚明的其他總集則是符合商業出版讀者的實際需求。而相比而言,清代的《古詩源》與《采菽堂古詩選》兩部總集或許可以認為是編者力求“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³¹。

在這樣一種讀者身分轉變為編者身分的過程中,“刪汰繁蕪”集中體現在“抄”或“錄”的行為。《采菽堂古詩選》康熙刻本原書名為《漢魏六朝詩鈔》,

28 沈德潛:《例言》,《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

29 對陳祚明詩學的概括與論述可見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13—229。

30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86,集部三十九,總集類一。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37,頁79。

31 同上。

“鈔”一字已點出此書以抄錄為主的編纂模式³²。在陳祚明弟子翁嵩年為《采菽堂古詩選》所作的序中，也談到了陳祚明此書的編纂過程：

見山人手鈔古體，自《卿雲》《擊壤》以及六朝，凡若干篇，悉自注釋，謂及門曰：“作詩不學古體，猶冥行者之昧昧於途也。雖跬步亦窒碍矣。”³³

由上可知，此書的編纂實際上始於陳祚明的“手鈔”行為。類似的字眼也出現在差不多同時代的稿本文獻中。明末清初藏書家祁理孫編纂的《古詩鈔》現僅存稿本，前有其孫祁安期的跋，在此祁安期說明了此書的來源：

奕慶公手錄詩九本，自上古迄西晉，精詳端楷，真玉寶也。³⁴

上面兩個例子中，“手鈔”“手錄”二字的出現，表明了這些書的生成模式：它們無疑都生於編者的閱讀行為，讀者在閱讀中抄錄詩篇，閱讀因此催生了編纂，讀者從而變成了編者。稍晚一點的古詩總集也是如此，從作者自序可以看到與上面兩個例子類似的實時抄錄式編纂模式。常州詞派領袖張琦曾選古詩總集，命名為《古詩錄》。他在此書目錄結尾處寫道：

今錄漢以來詩迄於隋代，導其源流，備其正變，旨義幽隱，輒為條述。³⁵

張琦在此坦陳此書乃“錄”詩而成，他也用“錄”這樣一個表示抄寫意思的字來命名他編纂的總集，這裏可看到閱讀催生了編纂——張琦閱讀了已有的詩歌資料庫，並進行了讀書筆記式的選擇式抄錄，從而成書。在此書中，張琦一

32 關於此書書名的變遷，可見張偉：《〈采菽堂古詩選〉的命名及成書過程研究》，《汕頭大學學報》2014年第30期，頁38—39。

33 翁嵩年：《采菽堂古詩選序》，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頁1。

34 祁安期：《古詩鈔·跋》，祁理孫：《古詩鈔》（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清稿本）。

35 張琦：《目錄》，《古詩錄》（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六年掃葉山房刻本），頁12b—13a。

共抄錄了 1 118 首 171 家詩人³⁶。這麼多詩的抄錄過程花了多久,是否歷時多年則不得而知。張琦本人在自己的別集《宛鄰詩集》的序言中談到自己學詩是從 24 歲(乾隆五十二年 1787 年)開始³⁷,那麼這本書是否其實乃其這麼多年的學詩筆記?或許,從乾隆五十二年(1787)到嘉慶二十年(1815),通過 28 年的學習,作為摘抄筆記的這部書才最後成書,他才決定將這部書出版。若是如此,那麼編書的過程無疑就見證了讀者讀詩學習的過程。

與張氏類似,身為八旗文人的穆爾查成書在其《多歲堂古詩存》序言中如此回顧自己的編書過程:

余於古詩,素所深嗜。苦其卷帙之繁而瑕瑜之混目也,嘗欲有所去取,以供披吟。而又牽於昔人漢魏六朝體格高卑之說,不敢別有所議。因思所以易之者而未有得也。間取馮氏惟訥所集《詩紀》讀之,盡屏諸選家品藻雌黃之辭不觀而獨與古人之詩相晤對,讀之既久,而後灼然若有所見也。……如是者年餘,始卒業。手自抄錄畢,命之曰《古詩存》。³⁸

這段詳細地描繪了成書本人從讀者向編者的轉變,和陳祚明、沈德潛一樣,他所讀的書是《詩紀》:“讀之既久,而後灼然若有所見也。”而他想要“有所去取,以供披吟,”也就是想要對《詩紀》所代表的古詩傳統按照自己的私人閱讀需求加以篩選。通過常年累月的閱讀《詩紀》以後,成書“手自抄錄畢”,這才編成《多歲堂古詩存》一書。

從這幾個例子可見,這裏所說的“實時抄錄式編纂”指的是閱讀與編纂過程一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清代文人從讀者轉變為編者,他們對經典總集——如馮惟訥的《詩紀》——進行閱讀,在閱讀途中進行詩篇抄錄。而後,他

36 張琦:《目錄後序》,《古詩錄》,頁 12a—12b。

37 張琦:《詩稿自序》,《宛鄰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刻本),卷 3,頁 13a。

38 成書:《序言》,《多歲堂古詩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頁 2b—3b。

們按自己的需求直接取用《詩紀》這個古詩資料庫，因此，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遍覽《詩紀》所輯的從上古至隋的篇章，進而按照不一樣的編纂目的或者個人閱讀需求去摘選原篇。

更多時候，除了《詩紀》這一資料庫以外，清代編者也會參照其他同類總集的文本資源。這裏所說的“參照”也就是現代意義上學者所言的參考書目之“參考”之意，這並非上文所談的“抄錄”式直接抄書取用資料庫的行為。雖然說，很多時候，清代編者不會像沈德潛與陳祚明一樣在書中清楚說明所選文本的直接材料來源，但是，他們會在序言等材料中點評所參照的同類前代總集，這些同類總集便是他們新纂總集的“參考文獻”，從他們的臧否及點評中我們可以看到其間隱含的古詩總集編纂動機與策略。

（二）臧否前書式編纂：參考前代與當代文獻

在《采菽堂古詩選》序言中，編者陳祚明的弟子翁嵩年曾如此點評其他明代的同類總集：“古體之選，莫昭明若矣！昭明所取嚴，未免遺珠之歎。況梁以後，有未經昭明論定者乎！《詩紀》《詩所》《詩乘》備矣，又微嫌其濫，不若茲編之精採也”³⁹。翁嵩年在這裏一共對一部前代經典（《昭明文選》）與三部明代古詩總集（《詩紀》《詩所》《詩乘》）進行了臧否，雖然陳祚明編書的資料來源是《詩紀》，然而，這裏，翁氏將《詩紀》與臧懋循《古詩所》、梅鼎祚《八代詩乘》一並作為批評對象。他雖然先承認了這些明代古詩總集的“備”，而後又對這三部書加以微微貶斥。除了《昭明文選》，這三部明人古詩總集都收到了“濫”的評價。這似乎是清代人對《詩紀》之後出版的晚明古詩總集的普遍意見，似乎可以看到，翁氏在這裏的評點與四庫館臣對幾部晚明古詩總集的評論頗為類似。

四庫館臣曾批評晚明出版的《古詩所》《古詩類苑》《八代詩乘》相較《詩紀》有很多不足。他們對《詩紀》有如下評價：“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作，

³⁹ 翁嵩年：《采菽堂古詩選序》，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頁2。

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別求。固亦採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也”⁴⁰。對他們而言，《詩紀》由於其“有韻之作，無不兼收”，因此可以用來“溯詩家之淵源”。相比較而言，晚明所出的幾本同類古詩總集都有種種缺點——他們認為臧懋循的《古詩所》“割裂分體，不以時代為次，使閱者茫不得正變之源流”；批評張之象的《古詩類苑》“又以題編次，竟作類書”；以及梅鼎祚的《八代詩乘》“僅漢、魏全錄，晉、宋以下皆從刪節，已非完備之觀”。⁴¹ 因此，他們認為前兩者並無以時代為序，最後一者則沒有全選唐代之前的詩，不夠完備。由此可見，四庫館臣對以時代而次古詩總集的重視。

對比幾條評價來看，四庫編者對《詩紀》的褒獎著重在於《詩紀》可以讓讀者看到文學發展史上的“正”“變”源流。因此，對他們而言，古詩總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便是可以使讀者了解整個詩學傳統，從而“溯詩家之淵源”。四庫館臣這樣的評價是從文學史、詩歌發展史傳統構建的角度出發，對先唐詩總集進行了清晰的文學史定位——先唐詩與唐詩不同，乃是唐詩之源。

沈德潛也是如此，從文學傳統的“源”“流”角度出發點明自己所編的《古詩源》與當時流行的總集之不同。不同於翁嵩年，除了馮惟訥的《詩紀》，沈德潛在這裏還列出了清初較為流行的王士禛《阮亭選古詩》。在例言中，沈德潛點評王士禛所撰的古詩選本，進而道出自己的選本在體裁上與時段上的選擇均不同於王氏：

新城王尚書，向有古詩選本，抒文載實，極工裁擇，因五言七言，分立界限，故三四言及長短雜句，均在屏卻。茲特采錄各體，補所未備。

又王選五言兼取唐人，七言下及元代，茲從陶唐氏起，南北朝止，探其源，不暇沿其流也。⁴²

40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古詩紀》一條，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89，集部四十二，總集類四。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 38，頁 52。

41 同上。

42 沈德潛：《例言》，《古詩源》，頁 4。

因此，沈德潛是《古詩紀》與《阮亭選古詩》的讀者，而他也成為了自己《古詩源》的編者。在這裏，他認為《阮亭選古詩》雖然“抒文載實，極工裁擇”，但是不夠完備，沒有收錄除五七言以外的詩，沈德潛點出自己並不像王士禛一樣分五七言體，而是“采錄各體，補所未備”。而在時段上，他與王氏的選擇不同，王氏所選詩從唐前一直選到了元代，然而，沈德潛想要“探其源，不暇沿其流也”，因此不選唐以後的詩。所以，在這裏，沈德潛自陳自己與王書的區別，點出了自己的選本更為完備，而且更重要的是凸顯了古詩傳統作為“源”的地位。這樣的文學主張與四庫館臣或者說當時主流文學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清代中後期以後，有更多的同類古詩總集在市場上進行流通，而新的編者在編選時，有時並沒有太多文學理論與文學觀的考量。他們往往也對同時代清代新出總集的組織與編選進行了更多臧否，進而提出自己較為實用的編選主張。比陳、沈兩位略晚一些時候的，活躍於清代中後期的張玉穀所編的《古詩賞析》便在書中提及了他私下讀過的多部同類總集。在成書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古詩賞析》凡例第一條中，張氏如此說道：

馮氏《詩紀》，備載皇古以至有隋之詩。俾不廢墜，洵懋厥功，然學者苦望洋矣。嗣後臧氏《詩所》，曹氏、陳氏《詩選》，遞加刪汰，終尚繁多。其他《詩解》《詩歸》《詩鏡》《詩淘》《詩發》等書，亦持擇欠善。茲集意務取精，為作詩程度。故所收甚隘，敢曰舉隅，聊資觸類耳。⁴³

這裏張氏列出了在他編書之時，也就是乾隆三十七年，他所能見到的9部明清古詩總集，並且加以點評。表2列出並總結了張氏序言中所提到的幾部總集及每部的優缺點。

43 張玉穀：《凡例》，張玉穀撰，許逸民點校：《古詩賞析》（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

表 2 張玉穀《古詩賞析》所提及的總集

張氏序言所提及的總集目前常用書名	優 點	缺 點
馮惟訥《古詩紀》	備載皇古以至有隋之詩。 俾不廢墜，洵懋厥功。	學者苦望洋矣
臧懋循《古詩所》	遞加刪汰	終尚繁多
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古詩部分有 13 卷) ⁴⁴	遞加刪汰	終尚繁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遞加刪汰	終尚繁多
唐汝諤《古詩解》		持擇欠善
鍾惺《古詩歸》		持擇欠善
陸時雍《古詩鏡》		持擇欠善
張守《八代詩淘》		持擇欠善
范大士、邵幹《歷代詩發》		持擇欠善

從這條材料可以清楚看到張氏的個人閱讀經驗。張氏作為讀者與編者，對明代及清代同類總集做出了“繁多”與“持擇欠善”兩類批評。按照年代而言，序言中提及的《詩紀》《詩所》《詩解》《詩歸》《詩鏡》這五部均為明代刻印的總集，早於張書而刊刻流傳。而其他幾部，即曹氏、陳氏《詩選》《詩淘》《詩發》則為清代總集⁴⁵，除了曹氏《詩選》刊刻年代與張氏一書刊刻年代接近以外，其他幾部均是產生於順康年間的清代總集。通過這樣的批評，張氏或許想要達到求完備與求精選之間的平衡。

張氏在對這些前代與當代同類總集加以臧否之後，進而提出自己所選篇

⁴⁴ 感謝許建業兄對此的建議。

⁴⁵ 除了陳祚明一書以外，其他幾部，如《詩發》《詩淘》等書筆者尚未得見。《詩發》出版年代參見臺灣“中央”圖書館書目信息，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6c/06.html>，2023 年 9 月 20 日訪問。此書為康熙三十七年(1698)刊刻。陳祚明的《詩選》則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刻。曹氏《古詩約選》現存則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參見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集部·總集類·通代之屬》(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2085。《詩淘》版本則有雍正六年(1728)刻本，參《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集部·總集類·通代之屬》，頁 2086。

目與其他幾部書的區別。與陳祚明和沈德潛關乎文學審美或文學史架構的編書目的不同,張氏明確指出他的編書目的是較為實用性質的,他力圖以此書所選篇目幫助讀者學詩:“意務取精,爲作詩程度。故所收甚隘,敢曰舉隅,聊資觸類耳”,其所選取的選目範圍比自己所提及的九部總集都更爲狹窄,內容上僅選“爲作詩程度”的詩。在他看來,這樣或許可以對九部詩集所涉及的兩個層面的問題都予以糾正。

這樣的批評與對同類文獻的臧否在清代古詩總集的序言中比比皆是。編者所提及的總集也各有不同。若仔細閱讀清代文獻,不難看到,《昭明文選》與《詩紀》是序言中最爲經常提及的兩部經典文獻,下表總結了清代六部古詩總集是如何提及《昭明文選》與《詩紀》的:

表 3 六部古詩總集如何提及《昭明文選》與《詩紀》的

書 名	如何提及《昭明文選》的	如何提及《詩紀》的
《六朝選詩定論》	昭明有選詩之目,世尚紛綸。(周亮工序) ⁴⁶	未提及
《詩集廣序》	若夫昭明選詩,興寄都絕。(詩集廣序題辭) ⁴⁷	馮汝言《詩紀》、高新寧《品彙》,古近詩稱爲善本。(詩集廣序題辭) ⁴⁸
《阮亭選古詩》	昭明之選所錄五言詩,自漢迄齊梁甚具,學詩者宗焉。然其中頗雜四言,又公讌應教諸篇率多蕪雜。予撰漢魏六朝五言詩視蕭選微有異同,至其菁英,鮮闕略矣。(凡例) ⁴⁹	未提及

46 周亮工:《選詩定論序》,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冊11,頁1。

47 朱嘉徵:《詩集廣序題辭》,《詩集廣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590,頁506。

48 同上。

49 王士禎:《五言詩凡例》,《阮亭選古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冊42,頁195。

續 表

書 名	如何提及《昭明文選》的	如何提及《詩紀》的
《采菽堂古詩選》	古體之選,莫昭明若矣!昭明所取嚴,未免遺珠之歎。(翁嵩年序) 50	《詩紀》《詩所》《詩乘》備矣,又微嫌其濫。(翁嵩年序) 51 古詩用《詩紀》本。北海馮公,博雅君子也,所撰集,不致闕略,敢先以問世。(陳祚明凡例) 52
《古詩源》	昭明獨尚雅音,略於樂府,然措詞敘事,樂府爲長。茲特補昭明選未及,後之作者,知所區別焉。(例言) 53	《詩紀》備詳,茲擇其尤雅者。(例言) 54
《古詩賞析》	《選》詩或分體而次其之前後以隸之,或分人而次其詩之各體以隸之,必較若畫一乃善。(凡例) 55	馮氏《詩紀》,備載皇古以至有隋之詩,俾不廢墜,洵懋厥功,然學者苦望洋矣。(凡例) 56

通過表 3 的羅列,可以看到,清代編者一般將《昭明文選》認爲是古詩選本的開端。他們對此書的評價有“學詩者宗焉”(《阮亭選古詩》)、“古體之選莫昭明若矣”(《采菽堂古詩選》),對他們來說,《昭明文選》標志著早就經典化的古詩傳統。如果說對此書有批評,那麼便是認爲此書的選取範圍不夠廣:“取嚴,未免遺珠之嘆”(《采菽堂古詩選》),或是認爲此書體裁區分不夠嚴格,如王士禎認爲五言詩中雜有四言(《阮亭選古詩》),或是認爲《文選》的詩沒有比興寄託,如“興寄都絕”(《詩集廣序》)。比較而言,對《詩紀》的評價則較爲統一,談到《詩紀》的時候,他們基本都認爲其是“善本”,會提及其“備詳”的特色,當然,這樣的特色對有的讀者而言也成了此書的缺點“微嫌其濫”(《采菽堂古詩選》),因此也在實用主義角度上造成了閱讀困難“學者苦望洋矣”(《古詩

50 翁嵩年:《采菽堂古詩選序》,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頁 2。

51 同上。

52 陳祚明:《凡例》,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頁 13。

53 沈德潛:《例言》,《古詩源》,頁 1。

54 同上。

55 張玉穀:《凡例》,張玉穀撰,許逸民點校:《古詩賞析》,頁 3。

56 同上,頁 1。

賞析》)。

和上文所述實時抄錄式編纂模式相比，這裏的讀者雖然或許也是抄書者，但是更多時候，從他們的序言可以看到，他們在選擇標準上有自己的想法，他們並非直接取用前代資料庫，而是對不同文獻進行交叉對比，加以思考，從而在閱讀中形成了對古詩總集體式和風格的概念，以及對總集編纂事業的總體感覺。

綜上兩個方面而言，這些編者或直接取用前人資料庫進行抄錄式編纂，或臧否前代與通代的古詩總集進而對現有文獻加以精心擇取與編排。作為讀者的他們，是不加思考的抄書者，也是頗有想法的編書者。通過這兩種編纂模式，這些編者完成了各種古詩總集的編纂，完成了編者的使命，而後，很多情況下，他們會進入下一個階段，經歷從讀者到出版者的身分轉變。

四、從讀者到出版者：未竟、滯後、同步的出版

在討論從讀者到出版者身分轉變的時候，若是細察新出的清代古詩總集，如上文第一部分分析所示，和晚明商業出版的圖書不同，很多書的成書年代與初次刊刻年代並不同步。因此，根據成書與初次刊刻年代之間的時間差，我們可將這些書分為三類進行討論。第一類是未出版的稿抄本，也就是那些有清一代均沒有出版的書，這類書有 12 部之多。第二類是滯後的印本，這類書的成書與初次刊刻年代之間有數年甚至幾十年的差距。第三類是同步的印本，這類書則和商業出版的書籍類似，編選與初次刊刻基本同步。

其實，不同的書籍得以被出版或者沒有被出版，總是因緣巧合，原因也是多種多樣，然而在下文的案例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讀者在這一過程中的能動性(agency)，也就是說，書籍編成以後，在進入早期流通時，不同讀者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從而導致了書籍的命運大為不同。因此，下文所述三類書籍的出版或許也呈現出三種從讀者到出版者角色轉變的途徑。有時，讀者並沒有轉換成出版者，有時，書稿的某些讀者會轉變為出版者，有時，編者自己就是讀者也是出版者。因此，通過探尋三種不同的讀者與出版者之間的角色轉換途徑，或

許我們可以管窺古詩總集在清代的多樣刊刻與生成過程。

(一) “識而藏之”：未出版的稿抄本

若是細查附表所收錄的 44 部新出總集，不難看到，其間有 12 部是以稿本、抄本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說，附表所收的書目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新纂先唐詩總集於清一代均沒有得以出版刊行，這些書籍目前仍然以稿本或抄本的形式存在於各個圖書館中(表 4)。再細查原書，可見有些書已有完備的出版體例但尚未出版，如現以稿本存於南京圖書館的《古詩麗則》便是如此。此書體例完備，開頭有兩篇序言，分別為楷書與行書寫就⁵⁷，第一篇署名為清代文人李棟，第二篇行書寫就的序言署名則為當時知名書法家宋曹。兩篇序言之後則有所選篇章的目錄羅列，但最終由於種種未知原因未能出版。與之相較，有的稿抄本無全書目錄，無序言，似並無出版意向，如題為袁枚手錄的《古詩正宗》現存臺灣“中央”圖書館⁵⁸，書前並無目錄或序言，僅可見到一些詩篇的抄寫與記為吳熙載的批點筆跡，頗似讀書摘抄。

表 4 以抄本、稿本形式存在的古詩總集

書 名	編者、抄者	清 代 版 本
古詩評選	王夫之	抄本
漢魏詩選	李澄中	稿本
古詩鈔	祁理孫	稿本
漢魏六朝詩選不分卷	□□	抄本
望舒樓古詩選	錢 霍	稿本
古詩麗則	王 湛	稿本
古逸漢魏六朝唐宋詩選不分卷	張 璘	稿本

57 王湛：《古詩麗則》(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清稿本)。

58 袁枚：《古詩正宗》(臺北：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清抄本)。

續 表

書 名	編者、抄者	清 代 版 本
古詩管	文 昭	稿本
聚螢齋古詩半解	劉敬輿	抄本
古詩正宗	袁 枚	稿本
古詩選不分卷	□□	抄本
漢魏六朝詩鈔不分卷	□□	抄本

對於體例完備的稿抄本,和印本一樣,通過閱讀序言等材料,我們可以看到書籍的生成與流傳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讀者在書籍流通時所扮演的角色較為多樣。比如,有的讀者僅僅是讀者,他們將書籍作為珍本收藏。明末清初藏書家祁理孫編纂的《古詩鈔》現僅存稿本,此本前有其孫祁安期的跋,在此祁安期說明了此書的來源與生成過程:

奕慶公手錄詩九本,自上古迄西晉,精詳端楷,真玉寶也。奕儀公得之以授……珍之二十餘年而授之安期,蓋壬辰歲也。⁵⁹

這部書為明末知名文人祁彪佳次子祁理孫(字奕慶)進行手錄式編纂而成,成書以後進入家族內部流傳,奕儀公得到了這部書。查考現存清代《山陰祁氏家譜》⁶⁰與《山陰祁氏世繫表》⁶¹,可知奕儀公乃祁苞孫(字奕儀),為祁彪佳兄祁鳳佳次子,乃祁理孫堂兄。而後,此書一直在祁氏家族中流傳,作跋的祁安期為理孫之子昌徵之第五子,他於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年(1772)得到此書,便為此作跋。於跋中,祁安期又談到此書之珍貴,並且認為應該世代傳承:

59 祁安期:《古詩鈔·跋》,祁理孫:《古詩鈔》(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清稿本)。

60 無名氏:《山陰祁氏家譜》(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61 祁昌徵:《山陰祁氏世繫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抄本)。

什襲既久,常恐授之不知者,以致埋沒,轉畀安期,俾得奉爲世守,其意亦可思也,況親爲奕慶公子孫而敢或屑越乎?識而藏之,雖百世勿失可矣。⁶²

“識而藏之”是作爲後人兼此書讀者的祁安期的態度。他“恐授之不知者,以致埋沒”,認爲此書須“識而藏之”,也就是將此書作爲家傳之寶世代相傳。這樣的態度進而造成了此書未能公開出版,並且湮沒無聞於世。這樣的態度與下一部分所談到的讀者不太一樣,下一部分所談的書籍是滯後出版的古詩總集,這些書籍最初的讀者往往是出版者,他們往往在得到稿本以後,想要通過印刷的手段將小範圍流傳的書稿公之於天下。

(二) “不敢秘匿”：滯後的印本

對某些清代總集而言,正式刊刻與書籍編成之間出現了延遲的現象。下表(表5)列出了目前可以考證到的四部滯後或延遲出版的古詩總集:

表5 延遲出版的一些古詩總集⁶³

書名(編者)	所查刻本版本	成書年代	最早刻本刊刻年代	成書與刊刻的間隔時間
漢詩音注(李因篤)	清康熙三十五年王梓孝昌官署刻本	1690	1696	6年
阮亭選古詩(王士禛)	清康熙天籟閣刻本	1682	1697	15年
采菽堂古詩選(陳祚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點校本(以清康熙刻本爲底本)	1655—1674	1706	32年(以陳祚明逝去年份爲准)
八代詩選(王闓運)	清光緒十六年江蘇書局刻本	1859	1881	22年

62 祁安期:《古詩鈔·跋》,祁理孫:《古詩鈔》(北京:南京圖書館藏,清稿本)。

63 此處的考證參考了這些總集的序言、現存版本,以及前人對這幾部總集成書過程的考證研究。

這裏所列出的每部總集的成書日期與可考的刊刻日期都相差甚遠，最短 6 年，最長 32 年。有的作者生前便已看到書籍的流行，而有的作者身後書籍才得以出版。王士禛《阮亭選古詩》的例子就屬於前者，按照《中國古籍總目》的記錄，此書現存版本衆多，並且現存的各個版本中均有很多名人提款、評點、跋語等⁶⁴，足見此書在當時的暢銷程度。目前可知此書最早編就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⁶⁵，初次刻本則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蔣景祁刻本，蔣氏在序言中說：“新城王夫子所錄悉古詩也……錄成，各撰例言十餘條，明所以或錄或否之意。親授景祁，景祁不敢秘匿什襲，持歸而雕版于江南，公同好也。”⁶⁶按照這裏的記載，這部書的原稿是王士禛親自授給蔣景祁的。根據當代學者考證，此書是王士禛應徐乾學邀請而編成的。選完古詩後，此書便在京師文人群體中小範圍流傳，掀起學習古體高潮，根據當代學者引述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二十六中的回憶，此書先以鈔本形式流傳於京師，一共有七部手鈔本。而清初崇尚宋詩，當時在京師的曲阜吏部官員顏光敏手鈔杜、蘇、黃、陸四家歌行，將王士禛的古詩選本抄錄在這些詩後面，這隨後“引發詩友們風靡唐宋七古的小高潮”⁶⁷。

十多年後，當蔣氏“持歸而雕版于江南”以後，刻本一出，此書便成為暢銷書：“蔣氏陽羨刻本一經刊印便售罄一空，離常州不遠的無錫、松江都難以覓得，刻書家也僅存一部底本”⁶⁸。而二十餘年後，此書已流傳頗廣，袁枚曾在《隨園詩話》中回憶自己少年學詩往事時，回憶自己因緣際會得到了“《古詩選》四本”⁶⁹——他“如獲珍寶”⁷⁰，“歲終解館時，便吟詠而摹仿之”⁷¹。很多年後，已然成名的詩人袁枚回憶起這件往事，認為他對這部書的閱讀標誌自己學詩的開始：“此余學詩所由始也”⁷²。

64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頁 2915。

65 蔣寅：《王漁洋事跡徵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73。

66 蔣景祁：《古詩後序》，王士禛：《阮亭選古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 42，頁 194。

67 謝海林：《清人宋詩選與清代文化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頁 103。

68 關於此書的初步流傳與影響見謝海林：《清人宋詩選與清代文化論稿》，頁 102—105。

69 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卷六，頁 189。

70 同上。

71 同上。

72 同上。

根據當代學者的考證,袁枚所提到的《古詩選》四本“非稀見之本,亦與王士禛生活時代相近、作品傳播廣遠等特徵相合”⁷³,所以疑似是王士禛《阮亭選古詩》之五言部分⁷⁴。這部書五言部分所選範圍是自漢而下,止於唐。雖然此書是古體詩的通代選本,然以其所選篇目的時代而言,大部分篇章仍然是先唐,五言部分“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⁷⁵。其時袁枚九歲,為雍正二年(1724),由此可見從康熙年間到雍正年間,二十多年間,刻本流傳廣泛,這部書的讀者也已經從最初的京師文人擴大到江南孩童。

也有作者未能親眼看到自己所編總集的流傳。陳祚明的《采菽堂古詩選》就是如此。按照當代學者的考證,此書為1655—1674年期間選定,陳祚明身後才刊行出版⁷⁶。現存的清刻本《采菽堂古詩選》⁷⁷收錄了作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翁嵩年序言,翁嵩年在序言中回憶陳祚明臨終囑託,並列出了此書的刊刻緣由:

山人考終時,檢以付嵩曰:“《三百》溫柔敦厚之旨,盡於是矣!吾恐今日言詩者俱入宋元一派,則古音幾不可識矣!”是編也,其亦有救時之苦心乎?山頽木壞以來,碌碌塵壒,未遑舉以問世。今校士之暇,編輯而刊布之,以為後學津梁。⁷⁸

由此可見,陳祚明選先唐詩實則想要在當時以此風對抗清初崇尚宋詩的風氣,“有救時之苦心”,暗含囑咐學生及時將書稿刊行之意。而翁嵩年作為他的學生,作為此書最初讀者,直到老師身後32年才有閒暇將此書刊印出版。

如果說《采菽堂古詩選》的延遲刊行並非陳祚明本意,那麼《漢詩音注》的

73 鄭幸:《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7。

74 同上。

75 姜宸英:《序》,王士禛:《阮亭選古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42,頁193。

76 張偉:《〈采菽堂古詩選〉的命名及成書過程研究》,《汕頭大學學報》2014年第30期,頁38—42。

77 依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凡例》所言,此書清刻本現有康熙、乾隆兩個版本。見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頁1。

78 翁嵩年:《采菽堂古詩選序》,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頁2。

出版故事則似乎展示出編者的苦心——編者想要為自己的書稿尋找到合適的刊行人而不願隨意出版或者說是故意延遲出版。據《漢詩音注序》記載，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年（1690），編者李因篤將書稿交給了同鄉王梓，並對王梓說道：

“僕四十年專心併力，評注是書，丹黃載筆，凡數易稿，自覺獨有會心，今脫稿初成，索觀者衆，卒未之與。詎敢矜慎自秘，顧思得其人耳。子天下士也，舉以歸子。”誼諉鄭重而別。⁷⁹

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編者“詎敢矜慎自秘，顧思得其人耳”，說的是他是想要將這部書出版。不過，他又要為這部評點式漢詩總集找到合適的代理人從而出版此書（“得其人”）。作為第一讀者的王梓，在得到書稿以後，果然不負重托，過了幾年便將其刊行出版了。王氏在序中談完編者的囑咐之後，繼續寫道：

余敬受而藏之，旅次稍暇，燈窗手錄，迴環吟咀，略窺作者大旨，而余五言古體亦因之增益焉。屢思公諸世而未有其會。……歲值賓興大典，徵調入闈，公事餘閒，追憶舊遊，莫有先先生者，因編輯成帙，付諸剞劂。以嘉惠後學。⁸⁰

作為讀者的王梓在這裏詳細描繪了作為第一位讀者的閱讀體驗，在他旅途休息時便讀此書，這本書使得他的“五言古體亦因之增益焉”，對他的寫詩與創作為頗有益處。因此為了“嘉惠後學”，於六年後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將此書付梓刊行，並在序中詳細記錄了編書與刊刻過程。

從以上三部書的刊行過程足見這三部總集最初讀者的身分已然從讀者轉為印刷刊刻者。後兩個故事中的書稿編者均非主持刊行之人，這兩部書的編者雖欲將此書及時刊行，然而均需要有賴於合適的人選，才能最終將書籍進行

79 王梓：《刻漢詩音注序》，李因篤輯評：《漢詩音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冊401，頁690。

80 同上，頁690—691。

公開出版。這裏的出版模式與晚明職業作家爲了盈利而參與的商業出版⁸¹大爲不同,成書與刊刻年代往往不同步,出版是滯後的,延遲的。在編就之後,這些總集便進入小範圍群體的流通,爲編者及文人群體所閱讀,讀者閱讀以後,看到總集有從私人閱讀群走向公開刊刻的價值,才會進入正式出版。

經過一定範圍的流通之後,在正式出版時,作爲最初讀者的印刷者在營銷與寫作策略上似乎頗有類似之處。蔣景祁在自陳《阮亭選古詩》的出版緣由時,說“不敢秘匿什襲”,同樣,翁嵩年序言結尾也有類似的語言:“未敢私爲一家之言,一人之學也”⁸²,而在王梓的序言中,李因篤對王梓說“詎敢矜慎自秘”。類似的語言與語句放在序中,似乎爲這類總集加上了一層神秘色彩,讓公衆認爲這樣的書籍原爲不傳之秘。這樣的敘述或許是真實的,又或許僅僅只是印本的營銷策略,以此來吸引購買印本的一般讀者。無論這樣的寫作策略目的爲何,和前一類總集不同,這些總集的最初讀者選擇將這些書稿刊刻出版以後,便將這些總集公之於天下,讀者進而不僅局限於文人群體,而是也會包括九歲的孩童袁枚。這些書籍因此從私人閱讀時的手錄而成的總集成爲了公開刊刻的書籍,承擔了傳播詩學傳統於天下的任務。

(三) “聊資觸類”: 同步的印本

清代中後期,兩部成書時間與刊行時間基本同時的例子有《古詩賞析》《古唐詩合解》,與上文談到的案例較爲不同,這兩部書的編纂目的較爲直接,編者在序言中往往以公衆讀者的閱讀需求爲主要考量。因此或許不難理解爲何成書與刊行基本同時。如上文曾談到的張玉穀所編《古詩賞析》,按序言所言,此書所選爲有助於讀者學習作詩的篇目:“茲集意務取精,爲作詩程度。故所收甚隘,敢曰舉隅,聊資觸類耳。”⁸³序言爲張氏乾隆三十七年(1772)所寫,而初刻本也是同年出版,但是,根據現代學者考察,後來一直沒有其他版本出現,直

81 見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7–148.

82 翁嵩年:《采菽堂古詩選序》,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頁2。

83 張玉穀:《凡例》,張玉穀撰,許逸民點校:《古詩賞析》,頁1。

到 1915 年，才出現了乾隆刻版的最新刷印本⁸⁴。

另外一部在清代中後期暢銷天下的《古唐詩合解》也是如此。此書以學習作詩的人為目標讀者，因此選取的詩篇都不太一樣。編者王堯衢在序中提到：“今惟取格調平穩，詞意悠長而又明白曉暢，皆人所時常誦習者載入茲編，以資近體之揣摩，非敢意為去取也。”⁸⁵不過，依施鰲存先生所考，後來這部書的古詩部分流傳見少：“《唐詩解》傳刻多，《古詩解》廢而不刻，書名遂稱《唐詩合解》，此‘合’字已不可通。”⁸⁶並且“此書在清代嘉慶、道光以後，除《千家詩》《唐詩三百首》之外，最為盛行。至民國初年，亦為暢銷書。石印本甚多，皆名曰《古唐詩合解》”⁸⁷。由於選入了唐詩，這部書與《古詩賞析》在後來的命運則截然不同。乾隆中期以後科舉考作詩，對清代一般讀者來說，他們或許對唐詩或近體詩的閱讀需求更為急迫，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古詩解》與《唐詩解》雖然同屬一部書，但在出版史上的命運卻截然不同。《古詩解》選古詩是為了以資近體之揣摩，最終目的仍是為了輔佐讀者學習近體詩。對於學詩入門人來說，近體詩有既定的法則較為容易學習，然而唐代之前的詩沒有韻律規則，並非學詩人所能輕易入門的讀物，或許也因為如此，兩個部分的流行程度大為不同，或許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古詩賞析》在乾隆三十七年以後就沒有其他印刻本了。

因此，雖然說書籍能否成功刊行往往總有出版經費等方面的考量，不過從這裏的例子可見，清代古詩總集是否可以成功公開出版或許背後也有編者本人的力量。若是編者本人編書動機是為了幫助時人做詩，那麼或許編者會在書籍編就之後立刻尋找將其付梓的途徑，若編者沒有將書目公之於天下的意旨，或許就會造成刊刻的延遲甚至缺失。⁸⁸

⁸⁴ 許逸民：《點校說明》，張玉穀撰，許逸民點校：《古詩賞析》，頁 5。

⁸⁵ 王堯衢：《凡例》，《古唐詩合解》（東京：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兩儀堂本），頁 4。

⁸⁶ 施鰲存：《歷代唐詩選本敘錄》，《唐詩百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781。

⁸⁷ 同上。

⁸⁸ 這樣的情況並非只出現在清代古詩總集的出版。見 Suyoung Son 對張潮出版事業的研究，見 Son, “Publishing as a Coterie Enterprise: Zhang Chao and Making Printed Texts in Early 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31.1 (June 2010): pp. 98 – 136. 也可見 Son,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pp. 32 – 42.

除了上面談到的兩個例子之外，叢編類先唐詩總集的刊刻與編纂時間往往是同步或重合的。叢編類圖書興盛於晚明。明代“叢編之屬”中先唐詩文總集有十多種，其中不乏較為出名的晚明張燮所編《七十二家集》、張溥所編《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以及汪士賢所編《漢魏六朝諸名家集》。這幾部都是大全式詩文合刻，它們按照作者，將漢魏六朝諸家作品應收盡收，應屬別集合刻⁸⁹。對比而言，到了清代，同樣的大全式叢編類總集則較少，直到晚清才出現了丁福保所撰《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如前輩學者所言：“中古文學總集的輯校，在清代沒有出現汪士賢、張燮、張溥等人所編的那種大型先唐作家專集，但詩與文的分別輯刻，既精且博，質量超過明代。”⁹⁰

與明代相比，清代叢編類先唐詩類總集出產數量明顯變少，根據《中國古籍總目》所收錄的明清二代的“叢編之屬”先唐詩文總集，可列出對比表格如下。附表中的清代“叢編之屬”僅有 2 種詩類總集，若加入下表中列出的詩文合刻總集，如胡鳳丹編《六朝四家全集》、楊逢辰所撰《建安七子集》，以及晚清丁福保的《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等，總數可至 7 種。

表 6 明代與清代新出“叢編之屬”先唐詩文總集對比

	明 代	清 代
大全式詩文合刻	七十二家集	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
	漢魏六朝諸名家集	
	漢魏諸名家集	
	漢魏六朝諸家文集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89 對這幾部叢編類文獻的討論，可見劉明：《漢魏六朝別集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 年），頁 472—485。

90 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頁 112。

續 表

	明 代	清 代
精選作家別集合刻	屈陶合刻(屈原、陶潛)	屈賈文合編(屈原、賈誼)
	彙刻建安七子集	建安七子集
	合刻忠武靖節二編(諸葛亮、陶潛)	六朝四家全集(陶潛、謝朓、鮑照、庾信)
	阮陶合刻(阮籍、陶潛)	晉三家集合鈔(成公綏、張載、張協)
	徐庾集(徐陵、庾信)	合刻曹陶謝三家詩(曹植、陶潛、謝靈運)
	陰何詩集(陰鏗、何遜)	陶謝詩集(陶潛、謝靈運、謝惠連、謝朓)
	劉沈合集(劉峻、沈約)	
總 計	12	7

對比上表兩欄中所列出的作家別集合刻，明清二代有一些總集較為相似。比如明清二代均有不少將陶潛詩與其他人別集合刻的現象，只是取來合刻的作家有些許不同。現存明代兩部合刻本取屈原、阮籍、諸葛亮與陶潛合刻，如時人研究所云，這樣合刻對象的選擇似乎可與易代詩學聯繫，暗合明清遺民的政治需求，⁹¹而現存幾部清代的合刻總集則並不相同，三部與陶相關的合刻均將陶與謝家兄弟或謝、鮑、庾三位知名詩人合刻，似乎體現出文學意旨的回歸，也就是說，這裏的三部合刻詩人的選擇，僅僅是從文學風格角度出發，從而將陶謝等六朝詩人並舉合刻。

清初卓爾堪、張潮、張師孔同選《合刻曹陶謝三家詩》中收入了三位編者序言，在序中三人都以問答形式提及時人的質疑，進而為自己辯護，回答為何合

⁹¹ 關於屈陶、阮陶合刻現象與易代詩學的關係，參見蔡丹君：《〈陶淵明集〉文獻與易代詩學傳統之關係》，《清華大學學報》2022年第5期，頁101—102。

刻曹植、陶潛、謝靈運三位截然不同風格的詩人作品。且看張潮所言：

世有宜孤行者，則孤行之；有宜合併者，則合併之。以合併者而孤行，不可也；以孤行者而合併，亦不可也。知峨嵋之雪，如匡廬之瀑布，皆孤行之物也。物既有之，詩亦宜然。若子建、淵明、康樂三家之詩，自宜孤行于世，今乃取而合梓之，得無近于不倫乎？予曰：“不然。惟其孤行，即取孤行者而合併之，則是合併其所孤行者耳，亦何不可之有？……今三家之詩具在，或質樸高老，或冲夷恬淡，或典麗精彩，不啻德秀之碑，可名三絕。又如善畫者，取峨嵋之雪，匡廬之瀑布，並繪齋壁，不誠洋洋乎大觀也哉！”卓子鹿墟及家柘園以合刻三家詩商之于予，予既從忠授梓，而復道其可以合刻之意云。⁹²

張潮在這裏承認曹植、陶潛、謝靈運三人的詩風格不一樣，就如同“峨嵋之雪”、“匡廬之瀑布”一樣截然不同且孤行於天下。但是，他隨後又以反問形式，提出合併孤行者又有何不可。他認為，將這些作品合刻如同把“峨嵋之雪，匡廬之瀑布”一起畫在牆壁上一樣，也是一種特色：“不誠洋洋乎大觀也哉。”這裏他的說法看似有些強詞奪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他的考量主要是從讀者角度出發，試圖帶給讀者嶄新的閱讀體驗，就像在牆壁上把不同景色畫到一起一樣。和張潮一樣，另外一位編者卓爾堪也從類似的角度為他們的合刻行為辯護：

余與張子山來印，宣體其意，輯三家之集，并彙古人評薦傳序。且搜求本集遺失篇章，合而梓之。或有詰余者，曰：“凡古之人合而傳世者，非性情相類，即出處相同，否則文章同一機軸，此三家者果可以合乎哉？”余曰：“五味各異其味，五音各異其音，貴能和而出之，故和美充口，韶樂盈耳。取三家而合之者，以子建之作，高奇華茂，情兼怨雅；靖節之咏，冲和恬淡，獨寫性情；康樂之吟，宏博富艷，鏤刻精微，學者能和而出之，豈不

⁹² 張潮：《合刻曹陶謝三家詩序》，卓爾堪、張潮、張師孔：《合刻曹陶謝三家詩》，劉躍進主編：《漢魏六朝集部珍本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冊46，頁4。

同於和美韶樂乎？”⁹³

在這裏，編者在序言中，並沒有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討論為何三位作者的作品可以放在一起。相反，和張潮一樣，卓爾堪反而承認這曹植、陶潛、謝靈運三位的寫作風格的確大為不同。隨後，卓爾堪也進一步為自己的選擇加以辯護。他也是從他心目中的目標讀者角度出發，認為三位作者雖文學風格不同，但是“學者能和而出之，豈不同於和美韶樂乎？”也就是說，在卓氏心中，作為“學者”的讀者去閱讀曹陶謝三家合刻本，就像去聽一段和而不同的韶樂一樣。

這個例子可見，當晚明已經出現了多種大全式先唐諸家詩文合刻叢編以後，清代的出版者在合刻已有文獻的時候，則刻意做出不同的選擇，以給讀者帶去新鮮的閱讀體驗為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卓爾堪、張潮和上文談到的張玉穀、王堯衢一樣，均是以未來書籍的讀者為導向進行書籍編纂與刊刻活動的。張玉穀想要讓讀者讀完自己精心挑選的詩篇以後可以觸類旁通，王堯衢則選擇較為流行的“皆人所時常誦習者”，從而試圖可以讓目標讀者揣摩近體詩（“以資近體之揣摩”）。他們二人與張潮、卓爾堪一樣，均心懷讀者，以公眾讀者的閱讀需求為編纂的最初考量。比較而言，這樣的考量在上文所述的其他編者筆下較為少見。因此，這幾個例子中，清代編者是讀者，也是出版者，作為出版者和編者的他們所考慮的是未來公眾讀者的需求，這也使得了這幾部書的命運與上文所談的那些書籍大為不同——這幾部總集的編纂與刊刻基本上是同步進行了。

五、小結：讀者的力量

綜上所述，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管窺清代先唐詩總集的編纂與出版過程，這一過程其間牽涉了讀者與編者之間的角色轉換，以及讀者與出版者

⁹³ 卓爾堪：《合刻曹陶謝三家詩序》，卓爾堪、張潮、張師孔：《合刻曹陶謝三家詩》，劉躍進主編：《漢魏六朝集部珍本叢刊》，冊46，頁7。

之間的角色轉換。首先,通過閱讀清代已流傳的前代或當代先唐詩總集,讀者對前代詩進行抄錄式編纂,翻閱並臧否前代與當代同類書籍,從而完成了從讀者向編者的角色轉變。通過對副文本材料的文本細讀,我們可以看到不少這類書籍的最初成書緣由是出於對前代書籍的私人閱讀與抄錄行爲。其次,新出總集編成之後,便牽涉到讀者與出版者之間的角色轉換。有的總集的讀者無意出版此書;而有的古詩總集先進入了編者自己的社交網絡,在文人群體中進行小範圍流通,然後因爲種種緣由,數年之後得以被有心讀者刊刻出版;也有的總集從誕生之時就是爲了面向公衆公開出版的,這些總集的編者多以普羅大眾或天下學詩人爲目標讀者而進行書籍編纂刊刻,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書從而被迅速付印,讀者同步轉爲編者及出版者雙重角色。

這些新的古詩總集以稿本或印本進入流通以後,不同讀者的閱讀體驗各異。且看一位孩童讀者的故事:

憶余年方舞象勺,已喜讀八代詩。塾師以爲妨帖括也,則扃巨篋中。夜分啟鑰,臚列泛覽,往往至雞唱就枕。賦質騫下,而一知半解,會心處,亦頗自怡悅。後得新城先生選古詩……間中反覆紬繹,不敢漫托於不求甚解,輒蒐討群籍,識諸簡端,歷時既久,丹黃排比,無復可泚筆。間有所得,更書小方幅黏之,垂二十餘年於茲矣!⁹⁴

這段記載出自《阮亭選古詩》之箋注本《古詩箋》序言,寫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這是《阮亭選古詩》的一位普通讀者聞人倓對自己少時讀八代詩經歷的回憶。他在13歲(“年方舞象勺”)時,對八代詩,即漢魏晉南北朝詩頗爲癡迷。在當時,由於科舉無需作詩,因此私塾老師將八代詩鎖在箱子裏。而聞人倓則在半夜偷偷讀詩,直到天亮。後來,他和袁枚一樣,機緣巧合之下,得到了王士禛的《阮亭選古詩》,則“反覆紬繹”。他還邊閱讀邊查資料做

⁹⁴ 聞人倓:《古詩箋序》,王士禛、聞人倓:《古詩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

讀書筆記：“蒐討群籍，識諸簡端，歷時既久，丹黃排比，無復可泚筆”。他在這裏充分利用印本書籍的物質屬性，在裝訂好的書中空白處進行批注，寫下自己的心得（“識諸簡端”），批注多了以後，他又貼上紙片式閱讀筆記（“更書小方幅粘之”），與當代做筆記讀書法頗為類似。二十多年後，他將自己的讀書筆記收集整理，出版了王士禎一書的箋注本《古詩箋》，而這個箋注本後來被當代編輯選中，加以標點及排印，進而成為現代人閱讀古詩選的首選普及本⁹⁵。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管窺清代先唐詩總集的出版路徑：讀者成為了編者，讀者也成為了出版者。讀者的力量可見一斑。由讀者轉化而來的新一代清代編者或抄錄、或參考前代經典及當代同類總集，進而開始編纂新出古詩總集，新舊總集因此通過材料復現、書籍互參而成為了彼此的參考或引用文獻，進而連接在一起，一起形成了大的知識生產與流通網絡。在這一網絡中，通過讀者、編者、出版者角色互動與轉化，通過對這些古詩總集所包括的重複文本材料的不斷重新選擇、閱讀、抄寫、刊印，先唐詩歌傳統便如此不斷以不同形式進入新讀者群體，逐漸流傳開來，進而傳入各個社會層面。讀者從而更為多樣，如文人讀者，又如初學詩的孩童與少年等。這個過程中，讀者讀詩、抄詩、編纂古詩總集，這也是一部分清代文人的學詩過程，也是清代人的詩學觀念得以建立的過程。因此，書籍的生成及閱讀過程，與文學傳統的傳播、文學創作及文學觀念的生成之間的關聯非常緊密⁹⁶。雖然說，詩歌傳統的傳播與文學觀念的生成過程並非古詩總集一類書獨力可完成，然而從這裏的討論可見，古詩總集作為古詩傳統的重要載體，其“傳播迴路”及形形色色的讀者在此過程中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或許也可以說，若明代見證了出版刊刻先唐詩總集的重新興起及文人對先唐詩傳統的重新關照，那麼清代古詩總集所形成的閱讀、流傳、刊刻之“傳播迴路”則見證了古詩傳統從精英文人向大眾讀者不斷滲透、普及的過程。

⁹⁵ 聞人倓：《古詩箋序》，王士禎、聞人倓：《古詩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

⁹⁶ 感謝匿名審稿人對此的建議。這一過程較為複雜多樣，筆者未來將專文探討。

附表：清代古詩總集一覽表⁹⁷

可能成書時代	書 名	編 者	類 別
順康	采菽堂古詩選	陳祚明	通代之屬
順康	六朝選詩定論	吳 淇	通代之屬
順康	古詩評選	王夫之	通代之屬
順康	阮亭選古詩	王士禛	通代之屬
順康	唱經堂古詩解	金聖歎	通代之屬
順康	漢詩音注	李因篤	通代之屬
順康	漢魏六朝詩選	季 貞	通代之屬
順康	合刻曹陶謝三家詩	卓爾堪	叢編之屬
順康	容與堂漢詩釋	錢二白	通代之屬
順康	漢詩說	費錫璜、沈用濟	通代之屬
順康	詩集廣序	朱嘉徵	通代之屬
順康	樂府廣序	朱嘉徵	通代之屬
順康	漢魏詩選	李澄中	通代之屬
順康	古詩肄及	任 璣	通代之屬
順康	八代詩揆一補遺	陸奎勳	通代之屬
順康	古詩源	沈德潛	通代之屬
順康	古詩鈔	祁理孫	通代之屬
順康	古逸漢魏六朝唐宋詩選不分卷	張 璘	通代之屬
順康	古詩麗則	王 湛	通代之屬
雍乾	古詩解	王堯衢	通代之屬
雍乾	八代詩淘	張 守	通代之屬
雍乾	古詩賞析	張玉穀	通代之屬

⁹⁷ 本表的數據來源來自《中國古籍總目》之“總集類”。參見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成書年代的排列綜合了原書信息、古籍總目所收錄的版本信息、作者生卒年等信息而製成。

續 表

可能成書時代	書 名	編 者	類 別
雍乾	古詩箋	聞人倓	通代之屬
雍乾	古詩約選	曹錫寶	通代之屬
雍乾	漢魏詩鈔	鈕孝思	通代之屬
雍乾	漢魏六朝詩選不分卷	□□	通代之屬
雍乾	望舒樓古詩選	錢 霍	通代之屬
雍乾	古詩管	文 昭	通代之屬
雍乾	聚螢齋古詩半解	劉敬輿	通代之屬
雍乾	多歲堂古詩存	成 書	通代之屬
雍乾	陶謝詩集(陶謝四家詩集)	姚培謙	叢編之屬
雍乾	樂府正義	朱 乾	通代之屬
雍乾	古詩正宗	袁 枚	通代之屬
嘉道	宛鄰書屋古詩錄	張 琦	通代之屬
嘉道	樂府津逮	曾廷枚	通代之屬
嘉道	漢鐃歌句解	莊述祖	通代之屬
嘉道	漢樂府三歌箋注	陳本禮	通代之屬
嘉道	漢詩統箋	陳本禮	通代之屬
咸同	詩比興箋	陳 沆	通代之屬
咸同	漢鐃歌釋文箋正	王先謙	通代之屬
咸同	八代詩選	王闓運	通代之屬
光宣	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	饒學斌	通代之屬
未知時代	古詩選不分卷	□□	通代之屬
未知時代	漢魏六朝詩鈔不分卷	□□	通代之屬

(作者：香港理工大學歷史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 無名氏：《山陰祁氏家譜》。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王士禛：《阮亭選古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42。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王士禛、聞人倓：《古詩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王宏林：《沈德潛詩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東京：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刻本。
- 王湛：《古詩麗則》。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清稿本。
- 朱嘉徵：《詩集廣序》，《續修四庫全書》，冊15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成書：《多歲堂古詩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道光十一年刻本。
- 李因篤輯評：《漢詩音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401。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祁理孫：《古詩鈔》。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清稿本。
- 祁昌徵：《山陰祁氏世系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嘉慶五年抄本。
- 沈德潛：《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11。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卓爾堪、張潮、張師孔：《合刻曹陶謝三家詩》，劉躍進主編：《漢魏六朝集部珍本叢刊》，冊46、冊63、冊66。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
- 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
- 施蟄存：《唐詩百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袁枚：《古詩正宗》。臺北：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清抄本。

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

張玉穀撰，許逸民點校：《古詩賞析》。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張琦：《古詩錄》。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六年刻本。

張琦：《宛鄰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鄭幸：《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

蔣寅：《王漁洋事跡徵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劉明：《漢魏六朝別集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

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年。

謝海林：《清人宋詩選與清代文化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二）論文

陳婧：《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從宏觀角度的考察》，《嶺南學報》第6輯（2016年7月），頁105—133。

張偉：《〈采菽堂古詩選〉的命名及成書過程研究》，《汕頭大學學報》2014年第30期，頁38—42。

蔡丹君：《〈陶淵明集〉文獻與易代詩學傳統之關係》，《清華大學學報》2022年第5期，頁94—106。

宋怡心：《清代古詩選本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22年）。

景獻力：《明清古詩選本個案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

二、英文

（一）專書

Brokaw, Cynthia &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how, Kai-wing.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on, Suyoung.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二) 論文

Chen, Jing. "Reinventing the Pre-Tang Traditio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Pre-Tang Poetry Anthologie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4.1 (2017): pp. 91 – 128.

Darnton, Robert.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11.3 (1982): pp. 65 – 83.

Son, Suyoung. "Publishing as a Coterie Enterprise: Zhang Chao and Making Printed Texts in Early 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31.1 (June 2010): pp. 98 – 136.

The Power of Readers: Reading,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Ancient Poetry Antholog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hen J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Ancient poetry anthologies, or pre-Tang poetry anthologies, remain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people to access,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pre-Tang poetic tradition. Throughou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pre-Tang dynasty poetry anthologies gradually became a trend. The emergence of a range of new anthologies in Ming-Qing period brought diverse reading experiences to all kinds of reader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new anthologies through switching roles to compilers or publishers. In recent times, scholar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ublication of such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not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materials produc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ewly produced ancient poetry anthologies in the Qing dynasty by focusing on the roles of readers. By delving into the materials of existing anthologi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quantitative and macroscopic analysis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existing materials by conduct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ntinues to discuss the “communication circuits” of these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role switching processes among readers, editors, and publishers. By doing so, this paper outlines how different readers became editors or publishers in various ways to explore and present a preliminary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investigation of the detailed process of reading,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ancient poetry anthologie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Ancient Poetry Anthology, Qing Dynasty, Reading Practice, Reader, Publication